

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

都 阳

【内容提要】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也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由于迅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的共同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但由于生育率水平下降迅速,相对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短,并行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低生育率水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已经显现,集中体现为人口结构变化成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因素。因应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市场转折,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政策都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人口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政策

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人口结构的快速变迁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人口因素历来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也是多样的,但其中通过劳动力市场发生作用是一条重要的路径。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以及人口因素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转折,并讨论这一转折时期的相关政策调整。

一、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人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会财富的主要消费者，也正是人们的消费构成了社会的最终需求。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变迁的双重视角观察，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有很多争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梳理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脉络，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认识基本上是消极的，人口增长“危害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强调所谓的“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很强的负面效果。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McNamara）阐述的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他认为，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亚于核子战争。同样的论断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体现。例如，1971年美国科学院发布了题为《人口快速的生长：后果和政策涵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人口增长的结果乏善可陈，而且列出了17条原因，解释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中获益。

这种理论上的思潮，也主导了那一时期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走向。据联合国的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有127个国家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计划生育，涵盖了当时世界人口的94%。^[1]

然而，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完全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其后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两类国家的分野，一些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很多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沼不能自拔，但它们的人口数量特征却可能很相似。由此，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悲观的“危害论”提出异议。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更加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物质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并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同样是美国科学院，也同样是就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发表的研究报告，15年之后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在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美国科学院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1）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2）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3）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4）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得到暴露。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人口增长“利弊论”的基本思想。

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享有红利而迅速发展，更使人们认识到

[1] Lavi-Bacchi,《世界人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简单地以人口多寡来衡量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人们越来越发现，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原因，要用更广泛的视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口数量上。这其中，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处于基础性地位。

尽管对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浩如烟海，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枚举也难以计数，但人们越来越达成共识的是，合宜的制度条件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科斯的研究成果为大家所推崇的原因。有了这个基本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长期以来，有关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的争论莫衷一是。但我们的确可以发现，现实世界中既有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好的国家，也有人口爆炸、陷入贫困陷阱难以自拔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解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首要地将其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寡。类似的是，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恰恰是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

有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合宜的制度环境，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人力资源。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转化成人口红利。经济学揭示了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增加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资本和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增长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会趋于下降。相反，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造东亚奇迹，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模式，贫困与低增长也相伴其中。积极化解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消极影响，对这些国家而言或许是必须的，但说到底，摆脱贫困陷阱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绝不是通过简单的人口调控就可以自然地走上康庄大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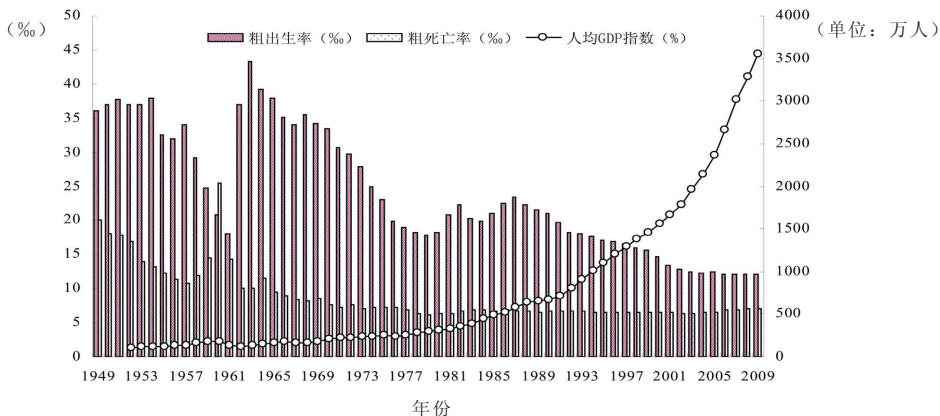
二、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

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较之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人口因素在短期内比较稳定，从中长期看也表现出非常稳定的趋势性。也正因为如此，人口因素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预期也非常稳定，从而使我们可以比较可靠地预测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因素和其他短期的宏观经济指标不同，由于具有较强的趋势和惯性，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它都难以改变。这越发使人口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一个长期重要因素。

我们首先来观察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从图1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粗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出生率水平的下降则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在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出生率经历了短暂的增长，随即开始下降，到70年代末才停止。生育率的第二次持续下降开始于1987年，随后，生育率下降的势头一直维持到现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2009年根据可比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是1952年的35.6倍。经济发展和出生率变动明显呈现出一个剪刀差格局。这说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

图1 中国的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及人均GDP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较之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低生育率水平。我们知道，人口转变一般都需要经历几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一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第二阶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三阶段。而人口转变所持续的时间以及人口转变乘数是度量人口转变过程的两个重要的内容。前者是指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开始到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结束所经历的时间，后者则是指人口转变结束和人口转变开始时人口数量的比率。欧洲国家比较早地实现了人口转变，其转变过程也验证了前面所描

述的几个阶段分布的规律。一般来说，一旦生育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则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但欧洲国家之间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如表1所示，法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持续期更长，但其人口转变乘数也更小。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进行比较，则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比较大的人口转变乘数。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其人口转变乘数为2.46，与多数欧洲国家相差无几。中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过程，并具有比较低的人口转变乘数，和中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同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表1 中国和部分国家（地区）人口转变过程的比较

国家或地区	转变开始和结束	转变持续期(年)	人口转变乘数
瑞典	1810-1960	150	3.83
德国	1876-1965	90	2.11
意大利	1876-1965	90	2.26
苏联	1896-1965	70	2.05
法国	1785-1970	185	1.62
中国	1930-2000	70	2.46
中国台湾	1920-1990	70	4.35
墨西哥	1920-2000	80	7.02

资料来源：转引自马西姆·利维巴茨：《世界人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然而，对于中国人口转变因素的分析，人们往往着重于中国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于抑制人口增长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雷伟立和弗里德曼（Lavelly and Freedman）就指出，早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严格的生育计划之前，生育率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导致这一时期城乡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1]但由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政府的生育政策初衷是一致的，一些政府研究报告更倾向于认为，生育政策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推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出生了2.5亿人口”。^[2]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育率下降的计量经济分析则表明，19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子女抚养成本的上升，对于生育率

[1] Lavelly, W. and Ronald Freedma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y*, Vol. 27, No. 3, 1990, 357~367.

[2] 国家计生委课题组：《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2000年，影印稿。

下降越来越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1]

由于人口转变进程的不断演进，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从196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少儿抚养比逐渐下降，老年抚养比则逐步上升，到目前为止，总抚养比仍然在下降。到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3%，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5%。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仍然较高，但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表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 (%)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总抚养比
1953	36.3	59.3	4.4	68.6
1964	40.7	55.8	3.6	79.4
1982	33.6	61.5	4.9	62.6
1990	27.7	66.7	5.6	49.9
2000	22.9	70.2	7.0	42.6
2009	18.5	73.0	8.5	36.9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摘要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的人口转变很快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的总体生产性不断增强，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1970-1995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2.0/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2.0/4.1）。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42.6%

[1] 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1]

三、人口转变与劳动力市场转折

虽然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人口转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人口转变成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力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取决于诸多因素，从两类最主要的力量看，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就业需求，而人口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

当然，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与结构以外，劳动力供给也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工资水平、参与率和失业率等。因此，当劳动力短缺出现，并由此推高劳动力价格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也会进一步进行数量调整。工资水平的提高，原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可能由于市场工资高于保留工资，而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因此，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失业率水平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失业人群成为劳动供给的来源。

相对于劳动参与率提升和失业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约束更具刚性。因为，人口变量是一个更稳定、不容易对短期的价格信号产生反应的变量。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可以估算今后一段时期内新增劳动力人口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该图中的两个时间点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1] 王德文、蔡昉、张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图2 2002–2030年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调查及预测（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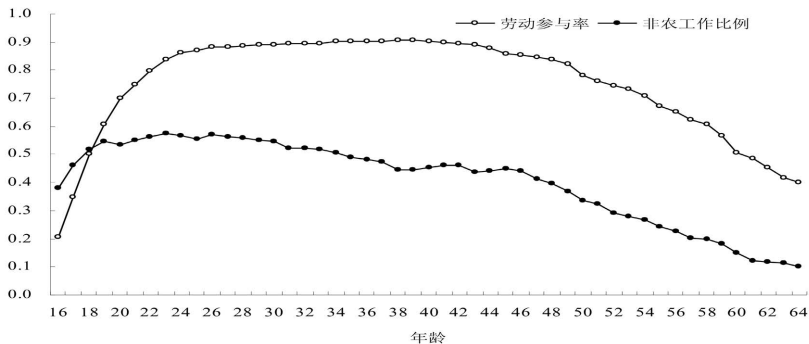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胡英、蔡昉、都阳：“‘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载蔡昉主编：《2010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其一，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由此开始较长时期的单调下降的趋势。“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为741万。回顾整个“十一五”时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外，其他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短缺状况总体上呈不断严重的趋势。

其二，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致出现在“十二五”结束之后。纵观整个“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十一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312万。考虑到就学时间的延长而导致的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的现实，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对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加之中国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旺盛劳动力需求，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工荒”为什么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局面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此外，由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刚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具有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使16至22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处于较低水平，图3清晰地刻画了这一趋势。该图显示，16~64岁人口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曲线。2005年16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20%，而16~22岁年龄组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55%。图3的曲线是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绘制的，考虑到2005年以后高等教育扩张的趋势更为明显，目前，年轻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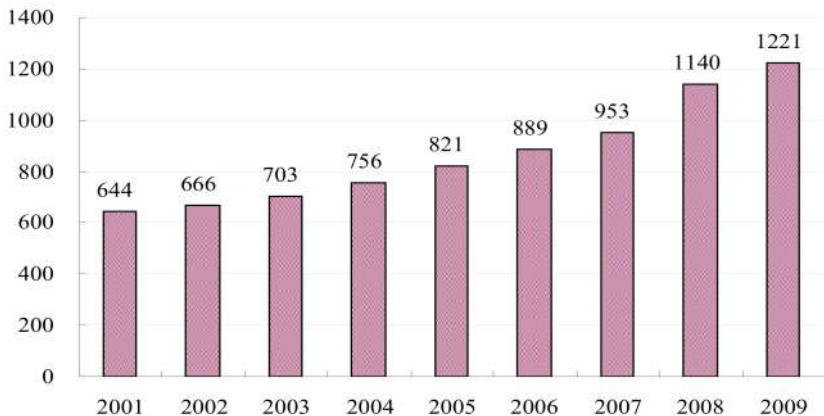
图3 2005年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是对劳动力增量的描述。增量分析的结果，解释了劳动力短缺为什么会出现在，以及是否由短期因素所主导。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供求关系的边际分析，并不是只针对农民工群体，而是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进行观察。可以想见的是，由于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增量上的差异不断扩大，必然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存量中弥补劳动力短缺的缺口。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构成看，劳动力供给的存量资源分别来自于两个部分。其一，继续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其二，挖掘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潜力。而只有当市场的工资率高于保留工资时，这两个存量部分的劳动力的供给才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持续上涨的原因。

图4 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单位：元/月）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

图4反映了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变化情况。历年的工资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为2001年不变价格。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民工工资，在近年来处于快速上涨的趋势。尽管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2008年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仍然有近20%的增幅。^[1]2009年，农民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为1221元，为2001年的1.9倍。考虑到农民工是劳动密集型就业的主体，以及其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产生推动作用。

四、人口因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因素具有很强的惯性，其变动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主要体现为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制约而引发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由于劳动力要素日渐稀缺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关系变化所诱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于农业劳动投入所面临的机会成本逐步增加所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由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不可避免。制造业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是国际间可比较的指标，近年来该指标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据测算，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0.63美元，2008年已经上升到每小时1.44美元，上涨幅度为128.6%，年平均增长率为14.8%，高于同期的GDP增长速度。在人口结构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随着低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效应进一步显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会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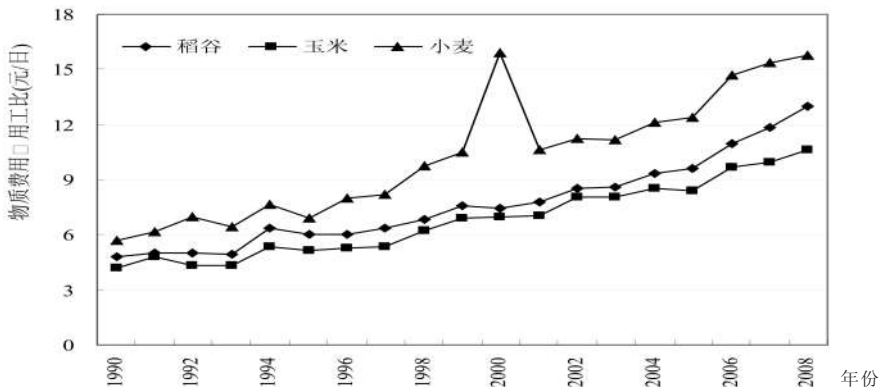
在面对劳动力短缺时，企业首先使用内涵的应对手段，如增加劳动时间、更多地使用工资相对低廉的外来劳动力替代本地劳动力等措施，来遏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但很显然，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使用农村劳动力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因此，虽然小时工资率没有显著增长，但由于劳动力短缺所产生的成本上升的推动力已经存在并逐渐增强。我们也可以预期，在企业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短期潜力挖掘殆尽之后，中国有可能迎来劳动力成本的更为迅速的上涨。

[1] 2007年和2008年的CPI处于近年来的高位，也增加了工资上涨的预期。

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1]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过程是诱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首当其冲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产生推动作用。而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总成本中劳动成本的比重较高，对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更加敏感。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会改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关系，并推动经济结构向后者转化。

如果考虑国际经济关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也会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削弱，并有可能由此改变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也是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群体）的收入提高，又会增加消费需求，从而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

图5 主要粮食作物物质费用—用工投入比变化



资料来源：Wang (Wang, Meiyuan,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3, No.2,2010, pp.137~153)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 计算。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并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非农部门就业机会日益充分，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的收入迅速增加，也就意味着农业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会显著增加。相应地，农业中的劳动投入显得越来越昂贵，并由此引发农户更多地使用机械、化肥等物质资本

[1] Minami, Ryosh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Japan: An Assessment of the Kuznets Hypothe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2, 1998, 39~58; Minami, Ryoshin and Akira Ono,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29, No. 2 (Jan., 1981), pp. 309~324.

投入，以替代劳动投入。如图5所示，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断增加，农业中单位面积物质费用和劳动投入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农民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会在农业部门诱致新的技术变迁以及农业投入结构的变化。

由于农业中单位劳动所使用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将使中国的农业越来越摆脱传统农业的小农特征，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效率的提高将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一起成为改善劳动者福利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口结构的转变是推动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五、转型期的政策调整

人口转变及其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等转折性变化，人口规模将不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下降，这也相应地对应对老龄化和完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只有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人口政策是与人口转变最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控制人口规模对降低总抚养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得以迅速地进入人口红利期。然而，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完成，迅速进入人口红利期的负面效应（人口红利期短）开始显现。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在人口红利期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从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人口总量规模，转化到人口结构是否合理。虽然我们很难估计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是否足以解决目前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但维系现行的政策则有可能加速人口结构的失衡。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在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机遇。一方面，少儿抚养比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以正规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建设面临着更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及劳动力市场的转折对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是一种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但是，一些公共政策领域改革的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供给潜力的发挥。其中，城市化政策是最主要的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依然明显，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地和工地分离，并导致他们在城乡之间往复。每

年春节期间的规模民工潮，就是最直接的体现。由于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的有效劳动供给时间也受到影响。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资料，2009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时间是268天；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就业时间为9.5个月。^[1]换言之，如果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能够逐步消除，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居住和生活，平均每个劳动力能增加将近2个月的有效劳动供给。

此外，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逐步下降，产业升级也就不可避免。而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反过来对产业工人的技能又提出新的要求。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继续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加强培训与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的结合，完善现有的培训体系以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有助于普通劳动者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挑战，也有助于企业更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

最后，需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激励劳动力供给。前面的分析表明，一旦劳动力市场上增量的劳动供给难以满足增量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就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存量中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一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但已有的分析表明，由于受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农村的劳动力存量主要是低教育水平和年老的劳动力，维持新的劳动供给的可能性已经很小。^[2]而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却持续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中国5个城市所做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城市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从2005年的61%下降到2010年的53%。考虑到劳动力市场规制不断加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可能对城市劳动力的劳动供给产生负向激励。▲

[1]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外出就业规模稳步扩大 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

[2] 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stepped in the era of low fertility. In practice, survey on birth and fertility rates has been mired in a strange statistical trap featured by ignorance of investigative results and reliance on subjective judgment. Continuation of that phenomenon will not only lead to erroneous statistics regarding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structure of age, but also cause ignorance of the risks posed by aging and could mislead the future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long-term population growth trend and decision-making.

The Rol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uo Xuejin

127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literature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opulation growth since the Thomas Malthus era. Based on that overview,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simple and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eir correlation is non-linear and uncertain. High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bviously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effect of moderately low fertilit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quit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The spreading of lowest-low fertility among some European and Asian economies since the 1990s has caused concerns over future prospects. The popu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have witnessed significant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and the country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hina should promptly adjust its strictly implemente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make it in line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emographic Changes,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Du Yang

136

Population could be a positive factor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a favorable economic system. Thanks to its fast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policy, China has enjoyed demographic dividen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 Compared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China has had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s going to face the demographic debt soon.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low fertility on labor market has already become obvious, as evidenced by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eing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 to encounter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Responding to the demographic and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China should adjust its population policies,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policie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VIEWS and COMMENTS

Implications of Financial Crisis for Economics / Reshaping Financial System / Why Has the Yen Failed to Become the Dominant Invoicing Currency in Asia? / Game Changer

He Fan

149